



学术文库  
XUESHU WENKU

# 汉语的衔接

*Cohesion in Chinese*

曹德和 著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黄山书社

# 汉语的衔接

*Cohesion in Chinese*

曹德和 著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黄山书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语的衔接/曹德和著.—合肥:黄山书社,  
2022.12

ISBN 978-7-5737-0587-7

I.①汉… II.①曹… III.①汉语-语言学  
IV.①H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22)第 251237 号

汉语的衔接

HANYU DE XIANJIE

曹德和 著

出品人 葛永波

责任编辑 胡月

责任印制 李磊

装帧设计 钱志刚

出版发行 黄山书社(<http://www.hspress.cn>)

地址邮编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7 层 230071

印刷 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版次 2023 年 7 月第 1 版

印次 202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00 mm × 1000 mm 1/16

字数 286 千字

印张 20.25

书号 ISBN 978-7-5737-0587-7

定价 68.00 元

服务热线 0551-63533706

销售热线 0551-63533761

官方直营书店(<https://hsss.tmall.com>)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

联系电话 0551-65859551

本书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汉语语篇衔接连贯规律的描写与解释》

(11BYY094)的最终研究成果。

## 引起思考:从篇章再到句子

### ——序《汉语的衔接》

史有为

曹德和先生要我为他的《汉语的衔接》写序。我自知对于语篇没有多少研究,不敢承诺,但架不住陆丙甫兄从旁鼓动,加之与德和兄有南昌大学之谊,也就硬着头皮应了下来。其实我心里有数,自己并非作序的最佳人选。我把这个委托看成一次学习,也看成给我一次思考的机会。借此机会,我可以交一份学习笔记而已。

我是写过一点语篇方面的文章,加起来也就两篇半<sup>①</sup>。一篇半是为了二语教学的,还有一篇是被华东师大拉去作报告,整理后在《修辞学习》上发表,其实没有多大进步。这些都是从二语教学着手,以二语基础教材作分析对象,比较局限,分析也就初浅,不大会涉及汉语语篇的细微特点与深层机制。

语篇方面的文章我看得不多,但这次是集中看了14篇,都是《汉语的衔接》(以下简称《衔接》)的内容。衔接,我在文章中称之为“接应”,其实都是 cohesion 的对应。曹书名为《汉语的衔接》,在书名上平行于国外开山之作《英语的衔接》(*Cohesion in English*),其意可敬。

《衔接》所论丰富,从语篇的广狭观到各种语篇衔接问题,再谈到相关的话题与主语争议,最后落实于“语篇推进”,让人目不暇接。其中有许多新的观点或新的发现,都让我印象深刻,也有同感。例如第五章(《语篇学核心概

---

<sup>①</sup> 笔者所写两篇是:《语篇、语篇法则和语篇教学——中国语教育学研究之五》,[日]《应用语言学》2004年第6期(收入《寻路汉语》时改名《语篇和语篇法则引论》);《汉语语篇连贯性问题概析》,《修辞学习》2004年第5期。另有半篇:《关于语篇—词汇主导教学——从对日汉语教学中词汇的地位谈起》,《对外汉语研究》2005年第1期。

念：“衔接”与“连贯”》)提出的“基于节奏衔接、音节衔接、韵部衔接、声部衔接、声调衔接的可及性乃至粘合力表现为由高到低的连续统(continuum),与此相应,则节奏衔接的连贯度高于音节,音节衔接的连贯度高于韵部,韵部衔接的连贯度高于声部,声部衔接的连贯度高于声调”,确实让人眼前一新。

《衔接》第七章还谈到“共轭衔接”,很有新意。“共轭”这个词很吸引人,但又有些生僻。笔者想了许久,才找到一个词“共枕”,也许可以用来理解“共轭”。共枕者,一定是不同大小高低的東西共枕于同一依托上。这个依托是一个可以共同容纳被依托者的概念或事物,而且地位有可能高于被依托者。用“共枕”来理解“共轭”,一下子就容易了许多。比如《衔接》中的用例:

(1) 头、颈、两上肢和右腿无运动障碍,/左下肢完全瘫痪。(张卫光《轻松学习系统解剖学》)

(2) 活是一条心,/死是一堆土。(袁勃《逃到甜蜜的地方》)

(3) 由于自己不小心,柴禾烧着了,/大火燃烧起来。([德]格林著,童欣译《格林童话精粹》)

例(1)划线词共枕于“躯干”,例(2)划线词共枕于“生命”,例(3)划线词共枕于“燃烧”。但“共轭”还有“控制、制约”之意,这是“共枕”所缺少的。于是,过去以为的“意合”,逐渐变得有了些许形式,让人可以把握。说明所谓的意合里有些还是有抓手的,并非完全没有形式的影子。只是这个形式并非西语的形态,而是汉语的有语义共处范畴的语义形式(词汇)。

《衔接》还尝试用“可别度领先原则”(the identifiability precedence principle)解释为什么存在无定数量名主语句,试用一种新的“背景信息”(background information)和“前景信息”(foreground information)概念来替换传统认为话题是“已知信息”、述题是“未知信息”,以此说明更多的话题—述题的搭配类型。这些都发人遐思,催人一探究竟。

《衔接》有许多观点都与笔者相同或相似。比如第四章谈到主语和话题的关系。书的作者“赞同将主语与话题视为交叉关系”，“话题特征如同焦点特征一样，不仅从未淡化过自身的依附性，而且没有丝毫迹象表明，它会最终放弃动态话语调节者的身份而转变为静态句法成分。再次因为我们注意到，主语与话题的语法差异并不是句法因素作用的结果，而是语用因素影响的产物”。

主语与话题为许多学者所纠结。笔者本人在话题的探究上有过反复和多次否定，曾在“主语等同话题”与“话题句法化”等方面为之伤神揪心，在最近的研究中才认识到话题与主语只能是交叉的，各自有其分布。这与本书作者走到一起了。话题仍应保持语用的身份，因为不是所有话题都是主语。话题只是一种语用上的蕴含，需要突显。而突显就需要条件和标记。这也许可以称为“话题蕴含观”，也可以为话题和主语的关系带来一些自由。

主语和话题，与语篇的形成关系甚大，因为它们发挥着特殊的衔接作用。有些被认为“意合”的，实际上是主语或话题以蕴含的方式在发挥接续作用。比如古代的小说或话本，就是讲故事，叙述事件的来龙去脉。很多话都是接着上文而来的，将前面的叙述，暗暗插入一个“欲知后事如何”，当作话题，然后展开“且听下回分解”，这分解就是下文展开的说明。一环套一环，形成一串一串“话题—说明”的叙述链。于是全文就这样衔接而连贯了起来。

至于诗词，当然也会有话题，有说明，但常常在更深的隐藏下发挥衔接的作用。例如：

(4)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李清照《声声慢·寻寻觅觅》)

“寻……冷……凄……”是三个分句，它们共同营造出一种氛围，它们共同拥有一个话题，就是“诗人此时的心境”，但隐藏而不说。这正是诗词的高

明手法,让每个读者都可以不自觉地代入,从而与诗人产生共鸣。而这三个分句又可以成为“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的话题,让“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成为画龙点睛的说明。最后这两个语段,“乍暖还寒时候”又成为“最难将息”的话题。高明的诗词就是不断设置蕴含式的空缺与勾连,包括话题蕴含式的空缺与勾连,让读者驰骋想象去填补,一层又一层地进入作者设计的意境,并衔接所有的诗句或场景,使全诗形成一个具有连贯性的整体。这些也就是《衔接》第七章所说的“同指衔接”。

又比如《衔接》第六章,其中指出:“借助衔接手段构成的,归于显性衔接(overt cohesion);借助语言环境构成的,归于隐性衔接(implicit cohesion)。”这与我在《语篇和语篇法则——兼及语篇教学》中提出的“显逻辑接应”与“晦逻辑接应”几乎一样。只是我不愿意用“隐性”这样的字眼,因为它们的逻辑联系的性质很微弱甚至时常晦暗、模糊,不但缺少逻辑性明确的关联词语,而且常常难以添加连词等关联词语以突显其间的关系。例如,“累了,在这儿休息一下吧”,不能添加连词说成“因为累了,所以在这儿休息一下吧”。这里既有因果的联系,也有承接的意思,介于两种逻辑关系之间,可以说是一种两可式边缘性的逻辑联系。故而觉得“晦暗不明”更能显示汉语的特点,更具有柔性,更容易与“显逻辑接应”连成一个系统。也许,这只是我对隐性衔接里多种情况的一种解读。

通观《衔接》,每个章节都是言之有物的,并非人云亦云,也无空语浮言,而是实事求是,有个性、有独到见解。我希望有更多的人能读到这本书,让语法研究走出传统狭小的天地,走向大语法。

阅读中笔者也约略了解到如今语篇研究的现状,学到不少新东西,也催生出点滴思考。兹记述如下,以明读稿所获。

**思考之一:汉语研究的再继承与真自信。**《衔接》第一章就论述黎锦熙和刘世儒合著的《汉语语法教材》第三编(以下简称《教材三》)。该教材详细分析了“复式句和篇章结构”,甚至论述了“形合”和“意合”,并注意到语音的衔接作用,包括语调和停延的衔接作用,注意到平行句式的衔接作用。

特别是语音衔接,这是该书首次发现的,尤为重要。它为汉语建构了一个相当全面的衔接手段系统。《衔接》评曰:“完全有资格被视为汉语衔接科学研究开山之作。”

笔者过去也曾读过《教材三》,但当时不以为然,觉得太繁琐,没有必要。在那个时候,学界的关注点都在单句结构上,甚至复句都不可能像单句那样的“幸运”。而这个疏忽,这样的狭窄,居然持续了半个世纪,是曹德和老师首次发现了《教材三》的现代价值,让人眼前一亮,提醒了我们,走出单句小天地,重新评价这部被忽视的著作(当然它还有许多不足)。这足以说明作者见识的不凡。

其实,再往前一步,看看黎先生那些曾经被批判的“句本位”“图解法”和“离句无品”说,可能也会有新的感受。黎锦熙一生以教学为业,著书也是为了语言教学。语言教学,必须以语句为出发点,从可成立的话语开始。这应该就是“句本位”的本意。承续了这样的思想,《教材三》才会走向句群和篇章。这与现代的做法是相仿的。“图解法”说明语句组合中的确存在核心成分,至今都无法否认,“向心结构”的结果就是一例。这其实还是现代思想之一。“离句无品”说的是大实话,离开语句,一个孤零零的概念,怎么知道它的功能与类属?现在词典中标注的词类无非都是想象在某一意义下会如何在句子中活动,或根据实际语料的表现,然后才分出的类别。这岂非无法“离句”吗?人们见到或听到一个词,可能会立刻有一种感觉:“哦,这个表示事物,那个表示动作。”这种感觉来自两个方面,一是词义或所指事物,一是使用现实。遇到“桌子”,你有再强的想象力也无法把它看成动词或形容词,因为所指已经限定。遇到“女人”,第一感觉也是名词。而所谓的“很女人”,“女人”的意义已变,当然也不能把形容词用法的“账”算在名词“女人”身上。所谓的使用现实,就是有多少用例用在某些位置。“动”这个词,怎么说都是在谓语位置上,好像没有“一个动”“我们的动”这样的名词或“大名词”的用法。说穿了,我们现在的“离句”后的类别不过是“有多少用例用在某处”的心理汇合,而非语词本身形式上的区别。即使是印欧系语言也是如

此。那些词形变化都是句中的表现,无法离开所指事物和使用现实。所谓的形态变化也只是它们的心理汇合。完全离开语句,汉语和英语一样,也只是一个“概念”,无法有形态变化。因此,词类和传统的词类理论都迷信不得。当然,黎先生有局限性,因为他的“依句辨品”过于接受西语中词类与句法成分之间一一对应的理论,又没有跳出教学,他没有把汉语句子篇章也当成一门理论对象来研究。他与刘世儒在《教材三》的问题上同样如此,太想实用了。但《教材三》里的许多思想依然光辉不减,他们实事求是的态度依然感染着我们。这总比依靠少数几个例子创建一套五迷三道的理论要来得靠谱。越过那段苏联模式的片面专断时光,我们终于可以冷静下来独立、自由地判断了,也应该重新认识那些中国语言研究先辈,切不要以为其早已过时。他们的研究蕴藏着许多以汉语为起点的合理思想,会给我们一些新的启发,会激励我们在理论上开创一番。

当前西方理论如潮,又汹涌而来。一时间,论文里不点缀几个“构式”“隐喻”“系统功能”似乎就过不去,可能就会被刊物审稿人打入另册。中国自《马氏文通》以来,经历了120年的近现代语言学的洗礼与探索,早该成人了、成熟了。如果依然像20世纪那样,奉西方时新学说为圭臬,那么这百多年的努力就白费了;或许只能证明我们太没出息、太不争气。难道我们没有大师?马建忠就是一位。“马建忠特别看重‘华文所独’的语法现象,不局限于西方语法单位概念,根据汉语章句传统,把‘顿’和‘读’放到非常重要的地位。当人们用后来的眼光指责《马氏文通》的‘自相矛盾’时,其实很少去体会马氏在汉语语法民族性上的苦心追求。”<sup>①</sup>马建忠之后,如赵元任、王力、黎锦熙、吕叔湘、高名凯、方光焘、朱德熙等多位前辈大师在创立汉语语言学的许多方面都做出了不同程度的系统性的贡献,并为中国风格的语法学奉献了富有启发性的学说。尤其是朱德熙开创了“词组基点”的学说,为汉语语法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们如今还有多少人会深入研究这些大

<sup>①</sup> 参见《中国语文》编辑部:《中国语言学的体系建设和时代使命——写在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五周年之际》,《中国语文》2021年第3期。

师的学说?很少很少吧?许多人又都一窝蜂地扑向了西方理论。

中国原是汉语的老家。走过 120 年,中国也早已是汉语研究的重镇和鉴别地。现在应该是西方研究汉语的论文用中文到中国来发表,让我们来鉴定高下。我们应该有这个自信。可惜,我们还有许多人对自己的家底一无所知,而对外国的理论却常常如数家珍。尤其是外语专业的学者,他们大都不清楚汉语研究究竟到了什么地步,有多少成果,解决了多少具体语言问题。他们似乎仍以介绍外国新理论、以汉语事实证明外国理论为己任,几乎与几十年前一样,不同的则是势头更猛,跟从者更多罢了。笔者不反对学习外国的理论,这些大师也是从学习国外语言学开始的。他们已经把外国的东西“咀嚼”过,也是在引进使用中跌过跟头、走过弯路后,才寻找到适合汉语的立足点。

想到这里,我不由得佩服徐通锵先生,他义无反顾地推出“字本位”理论,极大地冲击了建立于西方理论基础上的传统,显示了他的理论自信。尽管我主张“字—词”二元,尽管我不完全同意“字本位”甚至“本位”用语,但我还是要赞颂这种独立思考的精神。最近,四川外国语大学的王寅先生,也在“咀嚼”过西方认知理论之后提出了独创的“体认语言学”。王寅一直从哲学的高度,冷静平视着西方流行的从索绪尔到乔姆斯基的各种理论,站在人本主义的立场上批判地检视他们。“体认语言学”,就是他对认知语言学的一次本土化的创新。如果加上沈家煊先生最近的“名包动”“对举”“话头”等一些新颖的想法,中国的语言学者们似乎应该更多地关心国人的创造,应该多一些争鸣来深化对汉语的认识,而不要重走过去的旧路。

我们必须批判地继承前人的成果,也必须在此基础上去“咀嚼式”地面对所有新出现的东西。对待外来理论,当然同样要平视它们,批判地吸收,而绝不要尚未分辨就全盘接受。我们需要了解语言学的发展史,也需要清楚本国语言学的发展史。如果缺乏本国以及世界学术史的眼光,将可能导致前辈学者孜孜以求汉语真实的努力付之东流。我们绝对不能搞历史虚无主义,我们必须重新树立学术自信。否则,基础不牢,外来潮流一来,便立马

垮塌,只能随波逐流,永远成为附庸。

**思考之二:从衔接到相关性。**国外语篇研究一般区分出两个方面: cohesion 和 coherence。前者 cohesion 翻译为衔接或接应,其实还有黏着、黏着性、内黏性、连贯、词语联结等意思;后者 coherence 一般翻译为连贯,其实还有黏着、相关性等意思。前者规定为客观意义上的东西,后者规定为主观意义上的感觉。其实 cohesion 和 coherence 的构词基础是一个,都是由 cohe-(凝聚,内聚)而来。这两个术语在形式上过于接近。使用这两个类似的形式来区分很不相同的两个层次,对于中国人来说有些晕乎。外国的解释则更让人觉得有些玄乎。西方人喜欢从哲学层面去考虑问题,容易将简单的事物复杂化、抽象化;而中国人容易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比较讲究实在。二者各有利弊。西方对这两个术语的解释也许还是从个性与共性两方面去考虑的,很容易将我们的思想引向 cohesion 决定 coherence,还是 coherence 决定 cohesion 这样的形而上层面。或者他们不满足于个别语言的语篇研究,希望开创另一门共性语篇学之类的东西。从现实角度看,这些似乎并不太适合当下的汉语。我们能否从汉语自身来考虑一下,语篇里最基础的东西是什么。

暂时抛开这两个西方术语,从汉语本身来区分,语言本体无非就是形式和意义两个方面。语言研究说到底,就是研究相关性及其程度或手段,研究必需相关和可能相关。这包括形式和意义之间的相关性,也包括各层面或各部分内部的相关性,还包括语言本体和语境以及与使用者之间的相关性。进入交际的语言,从单句到复句,再到句群、段落等,它们中的基础问题无非就是形式与意义两方面的相关性。主语与谓语是如此,从句与主句也是如此,连接成篇后依然还是形式与意义的相关性问题。

单句中主—述—宾之间的形式相关,汉语用的是语序、格式和助词,西语就是形态上的主—述间一致性相关和动宾间及物性相关。单句内的意义相关,就是能否合乎事理。就此而言,汉语与西语基本相同,只是汉语的事理更宽大,更有包容性,西语的事理更狭窄,更像是逻辑命题的翻版。这二

者很难简单评价高低。因为汉语同样有逻辑命题式的句式。相反,西语却缺少汉语这样的宽容与灵活。

到了句群语篇,衔接或接应就是语篇在形式上的必需相关;连贯当然就是语篇在意义上的必需相关。意义决定着形式可以采取什么衔接类型,而形式也固化或突显了意义的连贯。形式相关采用关联词语与格式以及其他手段。意义相关就是能否成为一个合乎复合事理的复合述说。汉语的复句更像是句群语篇的缩小版。反过来说,句群语篇更像是复句的放大和延长。句群语篇以及复句的“通顺”就是合乎习惯与语言逻辑的形式衔接与意义连贯。在语篇这个层面上,汉语和西语的相关性也许反而有更多共同语言,否则语篇翻译将不可能被目的语受众所接受。

形式相关建立于意义相关之上,而意义相关也需要形式相关的显示与固化。缺乏意义相关,这样的语篇一定让人莫名其妙,觉得精神错乱;而缺乏形式相关的加持,那语篇意义的理解也就可能出现分歧或混乱。于是,整个话语,从单句到复句再到更复杂的句群语篇,就都可以统一于相关性了。

相关性还体现在语段与语境之间,没有语境的关联,很多句子可能就不能成立。什么叫合格的句子?过去我们往往根据一个句子孤零零地来判断,因此常常有不同的结论,有人说可以成立,有人反对。殊不知,在判断的时候已经加上了不同的语境,例如:

(5)? 房间里谁也不在。

例(5)这句话虽然每个语法环节都没有问题,但刚一接触,我们的第一反应是“不说”。我们平时说的是“房间里没人”,那是否判定它为“病句”?这又让我们犹豫。慎重些,再想想,就发现该句应该有上文,应该是承接问句的。当有人问:“张三在房间里吗?李四也在里面吗?”那时,我们会回答:“房间里谁也不在。”可见,句子的成立有两个条件:一个是句子本身在句法上是否合格,另一个是有无适合该句子的上下文或语境。所谓上下文,也就

是语篇的角度,可以看成言内语境。场景之类的语境则可以看成言外语境。这样一来,句子的合格问题,就可以看成句子与广义语境的相关性问题,也就是与广义语境的衔接问题。再如:

(6)老公!我有很胖吗?

——不会啦!你这样刚好。(台湾八耐舜子漫画中的对白)

又如例(6),对于标准普通话来说“有很胖”是不成立的,而用“不会啦”来回答简直是匪夷所思,有失连贯或通顺。标准的普通话答案是“不”或“不胖”。如果引入语境:台湾人的对话。那么这一段对答还是成立的,我们的语码标准必须转移到台湾的变体上。台湾的许多“国语”都是将闽南语的某些片段逐字用“国音”去“转读”,由此形成了台湾特有的通用语变体。在这里,“有”已经助动词化。对这种“有”,目前还存在分歧,有人认为还是动词,有人认为可能已成为助词。本人认为,这是一种表示存在或已然的新型助动词。“不会啦”里的“会”也已经作为习常用语“不会”里的一员而彻底改变了功能,与“啦”配合,共同起着肯定“否定”语气的作用。“不会啦”已经成为一种固定用语。至于是否属于词汇化的一种,可以再研究。

不同语言的形式相关有高低程度之分,甚至在同一语言中不同类型的句子或语篇也会有不同程度的相关。不同语言的意义相关,虽然也存在不同,但可能更多的是相似相近,大同小异,因此即使直译人们也能大致接受。从类型学上讲,形式相关性应该更显著,更有个性,也就更加急需研究。这就是衔接研究会被各国普遍重视的原因。《衔接》以“汉语的衔接”为题,正说明作者抓住了要害。

**思考之三:衔接手段的应用取向。**从口语到书面语,交际中的一个独词句“火!”一个招贴“禁止吸烟”,都可以作为语篇看待。但这些独词独句的语篇,无须言内的衔接手段,而只需要与言外语境衔接。只要与言外语境配合恰当,就是好的衔接,就可以成立。但我们更重视的还是言内的衔接。言内衔接的手段非常多,即以显性衔接而言,《衔接》提到的有:关联词语、标点

符号、同指、共轭、押韵、谐音、节奏与平行句式等衔接手段。有的明显倾向于语言的通用类型,适用于一般的口语或文章,有的则倾向于书面或高层次应用,有的则更多用于文艺性诗文。

比如,《衔接》分析押韵、节奏和平行句式等有着衔接的功能,对此,笔者也曾提出与其相当的“韵律呼应”。笔者认为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可以利用语句长短、节奏、平仄等配合的高层次接应手段,一般在书面文章中使用,在基础口语阶段一般不必学习。其中又可分为三种:长短接应;节拍接应;声调接应。其级别和难度按次序逐级上升。律诗则是韵律接应的最高典范。韵律由于牵涉到句子或结构,因此,同时也是结构配合类手段。<sup>①</sup>

《衔接》所说的平行句式就是通常所说的排比句格式和对仗格式。这当然是一种更为特殊的衔接。这种衔接的取向本就比较模糊,可以是消极修辞,更多的是积极修辞。我们也可以推一推,完全归入积极修辞。但从话段和话段之间的关系看来,又未尝不是衔接的一种。尤其是对仗,其特殊点在于,往往可以将表面意义上毫不相干的两类事物放在一起,用对仗联系起来,从而成为另一种供人欣赏的语篇。这是特殊意义上的衔接,所产生的也是更具文艺气息的语篇。因此,这样的衔接就涉及了文章学甚至文艺学的范畴。语篇衔接是属于消极修辞的,而文章学更多的是积极修辞。后者好歹还可以算是广义的语言学。至于文艺学,则完全属于艺术范畴。我们且举几个例子来看看:

(7) 东家门里有酒肉,佃户家中无米面!(贺敬之、丁毅《白毛女》,曹书用例)

(8) 天上一弯月,人间万盏灯。(傅桂香《桂香诗词续集》)

(9) 绿竹别具三分景,红梅正报万家春。横批:春回大地。(张文清《对联大全》)

(10) 南通州,北通州,南北通州通南北;春读书,秋读书,春秋读书

<sup>①</sup> 参见史有为:《汉语语篇连贯性问题概析》,《修辞学习》2004年第5期。

读春秋。(辛远《最新实用对联大全》)

(11)嫂扫乱柴呼叔束;姨移破桶令姑箍。(贾德江《英汉语对比研究与翻译》)

(12)冰(冰)冷酒,一点,两点,三点;丁香花,百头,千头,万头。  
(张允杰《对联知识一本通》)

例(7)是在同一场景中两个相对立的相关现象,共同描绘了旧社会,使描绘更加完整。

例(8)是貌似两个无关的景象,放在一起组合成天上地下相呼应的景象。

例(9)分别描绘了两个不同的植物,竹子和红梅,似乎并不相关,尤其是上联的绿竹可以在春、夏、秋三个季节出现,但在横批“春回大地”的导引下合景于一体,显示“春”归的效果。也就是说,对联的衔接是特殊的,常常需要更大或更高的语境才能显示其特殊的“连贯”。

例(10)的上下联则完全没有语义或事理的关系,是一种“语言游戏”。这显示该种衔接不但是特殊的,也可以是纯技术的。

例(11)利用四对同音词来组成上下联,这也是一种语言游戏。同样,押韵、谐音、语音节奏等手段也必须建立在语义相关的基础上,否则就会成为语言游戏,而不可能让该韵文成为具有连贯性的有意义的语篇。

而建立在汉字基础上的形体衔接,则更需要谨慎,搞不好就很容易成为“文字游戏”。例(12)就是这种情况,上下联在语义上毫无联系,也很难共处于一个更大的语境之下。这样的衔接确实构成了汉语的对联,可供欣赏,但也只有语言文字游戏上的赏玩价值。

以上例子告诉我们,语言的应用其实很广,远非传情达意那么单纯。人的语言除了有交际功能,还有娱情养心的功能。我们的研究过去仅关心交际,而忽视怡乐,这是一个缺憾。这些例子也告诉我们,衔接手段有应用的取向问题。哪些倾向于消极修辞时使用,哪些更多地在积极修辞时使用,应该也是语篇研究的一个课题。

语篇研究与文章学<sup>①</sup>常常有交叉,文章学又与文艺学等有着说不清的关系,都很难“一刀切干净”。且不管它们有多少“纠缠”,如果我们能把这些衔接手段都描写清楚、研究透了,自然也就明白应该如何应用了。这总归是功德无量的好事。

**思考之四:什么才是汉语的句子?** 我们常常困惑于标点与断句。一句话,到底何时结束,何时又可以重新起头。我们现在受到太多西方句子观念的影响,以为句子必须是有主语的。哪里有主语,哪里就可以作为句子的开头,于是句号就点在该句的前面。殊不知,汉语隐匿的主语或话题,恰恰是一种衔接手段,可以使得文章简练且流畅。受西式句子的影响,有些语文教师就以这样的句子观教育学生;有些国人(尤其是中小學生)接受这样的句子观,笔下的文章就渐渐主语频频,变得一板一眼,不再生动,也不再流畅。欧化已经从长修饰语开始逐渐侵蚀到汉语句子的架构,侵蚀汉语的衔接系统,甚至侵蚀中国人的语感以至思想。这不得不让人警觉并格外警惕。

西语是屈折形态语言,汉语缺乏屈折形态,是孤立语。因此,西语的句子基本上带着主语。这是它们的句法要求使然。而汉语是一种很借助语境的语言,这使得汉语很简洁,每个小句也精干。汉语的句子完全有权也有理与西语不同。汉语是以“意”(传统所谓的“气”)来控制语句的开头与结束的。“意”是什么,就是针对一个“话题”陈述一个相对完整的“事”。换一种说法就是:一个相对完整的“意”或“气”,即一个广义的“事”。所谓广义的“事”,就是将一个判断、一个评论、一个描述,也当作“事”,而并非仅仅动词性叙述才可以归属为“事”。“意”尽“事”止,句子方打圈结句。主语并非句子的必备。主语可以承上或依据情境而省略,只要“事”的过程相对完整或

<sup>①</sup> 文章学也称辞章学,是研究文章内部的规律和读写文章规律的科学,可以定位为与诗学、散文学类似的学问。内容包括修辞学和风格学。它更多着眼的是如何立意谋篇,如何适境定位,如何得体美辞,如何鉴赏评识,如何获得效果,更多的是积极修辞。也有人将文章学内容归纳为句读和段落、句子的安排、文章的省略、文章中的会话、文章的静境、文章的动态、文气等,基本上就是研究语言板块的设计、设置、修饰、布局以及鉴赏评价。